

东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期目录

(一) 东莞中医史话⑤

东莞中医群团沧桑史……………何炎燊 (1)

(二) 东莞草织业简史…………… | 刘炳奎 | 方玉成 (6)

(三) 东莞炮竹烟花业兴替述略……………罗 銓 (31)

(四) 东莞腊肠简介……………尹 植 张铁文 (40)

(五) 东莞火柴业概况……………郑 润 (43)

(六) “游泳之乡”题名录……………李永康 (49)

(七) “举重之乡”与举重健儿……………石龙体委供稿 (53)

(八) 中国曾国强陈伟强赖润明赢得奥运会
金牌银牌非偶然……………陈燕茂 (55)

(九) 东莞胜景名山
凤台秋霁……………张俭东 (58)

(十) 石龙史话①
石龙的兴城……………黄震杜 (63)

编后话

东莞中医群团沧桑史

何炎燊

（一）东莞中医公会之兴衰

诞生——民国十一年（1922）东莞中医界名宿张子绳、卢月湖、邓寿生等人，为“联络感情，增进医学知识，及趋应世界协助潮流起见”，（此数语见《筹组中医公会倡议书》）发起组织东莞县中医公会。当时参加者有全县各地中医三百九十四人，选举张子绳为会长，罗闾樵、卢月湖、邓伯南等三人为副会长，邓寿生为评议长，（相当首席监事），李翼农等十人为评议员，卢伯衡等二十二人为干事员，骆渠孙、单叔俊二人为会计收支员，何友文等六人为文牍员。假借勉行善社为会址，四月十八日往县政府批准备案，正式成立。

发展——当时会务活动，大致有四：一、发赠诊券，贫者可向公会领取，凭券到各中医诊所免费诊病；二、定期集会，联络感情，交流经验；三、保障医权，凡会员被藉端诬告或勒索者，由公会出面，主持公道；四、加强医药联系，收集会员及群众所反映情况，经常忠告药肆，认真炮制，选用地道药材，细心秤准，以重人命。此四者皆利世便民之举，六十年前，中医界无权无勇，而能有此作为，盖众志成城，团结群力量也。

张子绳歿后，由陈协卿任会长，邓竞持继之。筹建会馆

（两层楼房）于高第街，以款项不足，商得一法，规定凡向政府新领开业执照者，须先取得中医公会会员资格，入会费则由五元增至三十元。邓乃当时县长邓庆史之兄，故此事进行顺利，会馆于1933年建成（即现在新华书店一部分），邓曾撰文叙其始末，刻碑为记。（1961年，该馆被借用为户口站，石碑被毁无存）

波折——抗战期间，莞城沦陷，中医公会活动停顿八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春，召开会员大会，选举李翼农为理事长，单叔俊为首席监事，并由中青年会员陈沛如、何炎桑等协理日常工作，会务遂渐趋活跃。翌年改选，李翼农连选连任，而国民党政府竟故意不派人出席监选，事后始通知说此次选举无效，以致公会濒临窘境。当轴者派人暗示，须请谢星台老太爷出山，始能解决问题云。于是李翼农、单叔俊等以大局为重，亲往拜访谢老太爷，愿以理事长相让。乃重开大会，张设筵席，国民党大小官员，联袂而至，频频举杯为谢老太爷寿，所谓谢老太爷者，国民党少将军官谢玉裁之父也。“少小离家老大回”，在外数十载，不知作何勾当，1946年突然在莞城悬壶问世。至是，谢老太爷连任两届不理事之理事长。1949年春，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谢仑皇逃港。不久，陈沛如亦病故，公会事务暂由何炎桑摄理。

壮大——1947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师条例”，凡开业中医，须一律经考试院考试或检核合格后，始能领取卫生部之中医师证书。申请检核所必须具备之资格乃“执业五年以上，具有群众声望，取得当地政府证明者”。而国民

党政府对中医界之资历声望固茫然无知，惟有以中医公会所出具之“年资声望证明书”为凭，依样画葫芦，照发可也。于是，畴昔尚未入会之正式中医以及走方郎中，药材老板，欲取得一中医医师资格者，纷纷申请入会。中医公会之实际负责人陈灿如深知此乃中医界取得资格之最后一次机会，因检核结束后，无牌者即不能执业，今后将永无“执业五年以上”之资历者矣。陈欲壮大中医队伍，乃放宽入会条件，会员骤增至五百余人，为全省各县之冠。陈之立心非不善也，然会员既多，难免品流庞杂，良莠不齐焉。

改组——解放后，1950年中医公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改组，选举何炎燊为理事长。会务活动日多，如组织会员学习时事政治及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贯彻落实中医政策等。1954年县卫协会成立，中医公会并入卫协会内，此后不复单独存在矣。至于公会会馆，本乃中医界之财产，乃暂由卫协会代管业权。1962——65年，中医学徒班在此为课室，成为培养中医新生力量之场所。1965年冬，县中医院成立，该馆遂转由县中医院代管。

衰亡——1966年春，“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气候突变，卫协会宣告解体，依附于卫协会之中医公会亦随之衰亡。县中医院利用中医公会会馆设一门诊部，由李翼农、何炎燊在此应诊，中医公会两个时代之理事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又同在此处短暂栖留，可云巧合。果然，好景不长，不久，何即被揪斗囚禁，李翼农被驱逐回家，会馆亦被无偿征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矣！

再生——进入八十年代，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宣告成立，

1981年我县亦组成中医学会，全县中医界又有一科研活动、学术交流之组织矣。欢庆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昔年之理事长，老者已达九十五高龄，少者亦年逾花甲，虽历坎坷，喜犹健在，志不少衰，正与后起之秀，为振兴中医，共同前进也。（后记：本文脱稿后半个月，即1984年10月18日，李翼农中医溘然长逝，附志于此，聊表悼念之忱。）

（二）国医馆之黑幕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中医药界及广大人民群众之强烈反对下，被迫取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障碍”之余岩方案，转而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继续歧视、限制、排斥中医，以达到其最后消灭中医之目的；一方面又用怀柔政策，企图蒙骗与笼络中医，以缓和局势。于1930年成立中央国医馆，省设支馆，作为中医学术与行政管理机构。其实不过挂羊头卖狗肉，为无赖之徒开一玩弄权术，聚敛财贿之门而已。1931年，我县无聊政客邓秋生勾结以地主富商身份而以医为副业之刘蒿兰，赴穗夤缘营钻，省馆乃委派邓为东莞国医支馆馆长，邓返莞后走马上任，继而发号施令，规定中医处方笺统一由国医馆印发，每张收银五分；国药店则每配药一剂，须缴银一角。此例一出，无异向医药界征收苛税，因此众议哗然，群起抵制。刘蒿兰等自顾势孤，乃从中挑拨离间，拉笼较有名望之中医苏爵臣、莫联璋等为之羽翼，企图涣散中医界之团结。中医公会乃派李翼农、骆渠孙、叶仲衡为代表，向省国医分馆说明原委，几经交涉，始将国医馆收回，由中医公会主办。邓秋生、刘蒿兰乃销声

匿迹，据守石龙一隅，与中医公会分庭抗礼而已。国医馆既附属于中医公会，遂形同虚设。虽有李雨泉、徐寿如等人先后荣任馆长，然亦徒具虚衔，仅能为其本人之履历表“增光”耳。

（三）中医留医所变成“流产所”

解放前，乡村既无任何医疗机构之设立，名医又多集中城镇，农村医疗力量极为薄弱。危重病人，多来莞城求医，或舁以箩筐，或数人轮流背负，严寒盛暑，往返数十里，不仅费时失事，更且加重病情。欲在莞城栖留，旅店必不收容，戚友又多嫌厌。莞城中医界有见及此，于1946年倡议建一中医留医所，设简易病床20张，由全域名医负责诊治，以利远道病者就医。乘澳洲华侨黎和兴先生返莞之便，由单叔俊、翟镜湖会见黎氏，请其勸善举，得黎氏慨然赞助，答允筹措建所资金。其时集会结社及兴办一切福利事业，须先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始能进行。中医公会乃备文呈请国民党县政府审批。公会诸理事皆以为事关公益，济世利民，且无须国民党政府化费分毫，必获批准无疑，遂积极筹备一切。詎知半月后，接获批示云：“查留医制度，乃西医院所有，中医自古以来，并无留医所之名，所请碍难照准，应毋庸议。”寥寥数语，宛如倾盆冷水浇背，中医界之一场高兴，顷刻云散烟消。黎和兴先生得知，亦中止捐募。中医前辈，每论及此事，无不太息痛恨，而反动政府消灭中医之阴谋，则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矣！

东莞草织业简史

刘炳奎 方玉成

东莞草织业,百多年来真是变化万千,销场由近而远,品种由简到繁,技术由粗到精,在合营前其中所有变化,都充满着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尖锐矛盾。这项史料,我们虽然经过多方探索,直到现在知道的还是有限,这里谈的仅其简史而已。

一、东莞草织业的起源及其盛衰

东莞草织业始于何时,很难考证。一说远在十一世纪前石龙镇已有草织业的出现,产品有草席和草手套等,与紫金铁锅一道,由阿拉伯的海船输往南洋等地。另一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东莞还没有人工种植水草,虽然滨海的劳动人民老早晓得利用滩边田外的野生水草编织一些供自己作生活用品,但局限于就地取材,数量不大,且野生水草,纤维疏松,容易吸潮,韧度不强,色泽黯淡,是没有市场的,那时可以说还是野生水草制品的年代,经济价值不大,还不能列入行业的体系。其所以得称为行业,则在人工水草之后,即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东莞最早栽植人工水草的土地,是属现厚街区的上下石角围,和三屯乡附近,但都不过一百年左右。东莞现存人工水草的草种,如大穗红芽、白芽仔、黑仔、石竹等,都和

连滩相同，水草收割的方法以至席机的形成，操作工序和技术亦极似连滩。东莞草织业的技术来自连滩是无庸置辩的。连滩草织的兴起在1665年以后，盖自明末桂王逃亡到肇庆，大批宫庭人员和官吏，对床席的要求甚是迫切的，同时北方南下的难民又带来了许多手工业的操作技术，（像高要县广利的炮竹，就是显著的例子。）因而促进了连滩草织业的发生和发展。如在欧洲化学染料出现以前，连滩的技术工人已经知道用苏木加入槐水，浓缩后成为盐基性红色染料，拿来漂染水草了。

东莞原始的草织品，是“夹席”和“草手套”，这是将未经破开的野生水草，织成的粗糙东西。1845年后，帝国主义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连滩的草织品，也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但连滩到底受着地理条件限制，草田的扩张，从没超过三百亩。于是帝国主义的洋行和国内商人把希望转移到东莞厚街乡的草织作场。那里初期的主要产品是绳席，即把野生的水草加工成为穿鼻绳，再织成地席，但成品的质量远不如人工水草洁白明亮。后来人工水草的移植和扩展奠定了厚街的草织业的基础。据说1873年左右，道滘有一家叫做“黄祥记”和1885年的“国顺”，都是替厚街乡的席厂加工穿鼻绳的。当时具有一万人口左右的厚街乡，还觉得劳动力不足，而向邻乡发展，这证明了初期草织业的蓬勃气象。厚街当时是一个顽强的封建堡垒，外乡人在那里经商备受当地人的欺凌。本地商人稍有所得，就购买田地。但当一个行业发展的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的时候，决不是一个乡镇的地方封建力量所能遏止的。

人工水草的扩植，迅速地由东江下游，推进到珠江口，草织业的重心转移到涌口及双岗。这些地方封建力量比较薄弱，适应新兴的草织行业，象外地商人经营的“新得利”、“隆发”、“东棧”、“绍安棧”等，都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到了清季末叶，织成技术也有相当进展，并向外进口化学染料，使从前单一性的红色漂染，变成多种色素的图案花席。品种也不再单纯仿效连滩席，还吸收浙江温州区“宁波席”的“密经薄地”的款样，因此销途扩大，它生产经营的地域亦自厚街延伸至太平镇、道滘镇、莞城镇、石龙镇、望联乡，都有完整的行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南洋的橡胶业很畅旺，扎橡胶用的扭草，销量迅速增加。据香港草商尹良记的估计，1901年至1906年每年运到香港的，计街市草18,000担，扭草25,000担。日本草32,000担，据香港草织名经纪粉记的估计，在辛亥革命前几年，东莞席类出口每年约150,000包左右，1910年至1914年这四个年度草织品产销的高峰，东莞的草田面积增至26000亩，年产量约350,000担，草织的输出约180,111包。自从1914年下半年，因第一次欧战爆发，欧洲的市场丧失，美洲和澳洲等地虽然还有些销路，由于水上保险费和运费倍增，顾客缩手，造成产品积压，商号倒闭，作坊停业，草田丢荒。1918年欧战结束，生产本可回复旧观，但这时政治秩序紊乱，兵匪交扰，人民日夕在恐怖中，产量萎缩，1918年至1924年运销量估计比大战前减少12%至32%。到大革命时代，社会治安比较安定，但适逢海员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货运停止，香港的

洋行尤其是英籍的健洋行，和太平洋行等，立即采取对策，极尽胁迫利诱的能事策动厂商参加武装走私。的健洋行是太平镇和盛的顾主，太平洋行是埠源号的顾主，他们迅速加入大恶霸陈老七的武装走私集团，收买国民党地方反动官吏，与罢工的纠察队公然对抗。这时道滘乡匪首刘发仔、刘伦盘据了水乡一带，英国供给了他们大批新式武器，雇用近百艘武装走私船，厚街乡的东山、籍利、涌口的绍安、道滘的时香、均和等号，都参加偷运。他们不但将市场上水草压价，将工资压缩，而且将售价提升80%至100%。走私者虽然都获得暴利，但货量出口只占1924年46%左右。到了1929年至1936年陈济棠统治时代，治安虽然较平静一些，但又碰到了1930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危机，连续了几年，到1936年，各种水草销出仅22,000担，草绳的销出约7,000担，草席的销出约64,000包。著名的厂商革源，正是这时候倒闭的。1937年芦沟桥抗战后，南方暂时平静，但局势紧急，香港洋行对草织品投机抢购，生产骤趋活跃。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销路中断，虽然有些零星偷运，而数量不多，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到了1941年香港沦陷，生产全部停顿，整个行业破产，无一幸免，工人全都失业，饿殍遍地。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滥发纸币，工人整天劳动，不得温饱，又劳动力不足，社会秩序紊乱，新兴的厂号，一蹶不振。1948年太平镇最大的泰益厂已是支持得很吃力，莞城的兆兴祥正是奄奄一息，道滘乡的流记厂生产工具已被债主扣押，时香厂亏损净尽。解放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恢复而发展，虽然

战后的英、法、荷、德国民经济大削弱，美帝国主义采取敌视政策，长期禁运，但我们外贸政策取得了主动，克服困难，在外贸的经济战线上获得了持续的胜利，全县的草织业欣欣向荣，由过去手工业生产，逐步转入了机械化生产，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

二、制作上的特殊技巧、在国内 外享盛誉的原因及历史上的名牌产品

东莞草织品在国内销场是很狭小的，绝大部分是外销。得名最早的是涌口圩的五昌，他最著名的是街市席（即床席），1890年以前已经驰誉南洋等地，他的产品特色是结实耐久和色泽明亮，他重点的做法是三选，即选人、选草、造麻纛。他雇用工作熟练、操作勤慎的人织席。选草，先选质量，采购颜色光洁的麸草，更注意草身圆滑的石竹种，用草子长莫短（比如织制4尺2寸长度的席，本来用4尺8寸长度的草就可以，这是普通席的用料，要做上好的席，采用5尺或5尺2寸的草，这样才使纤幼的草尾剔除，席身才觉匀滑）。席纛是席的经线，一线断全席便破裂，如果麻质不良，纺工不匀，往往发生断线的毛病，因此，替他收购麻纛的吴沃，不惜增加工值来收取最标准的麻纛。在加工的工序中，凡拍席、收口、收晒、以及保管，都做得十分周到。他出名后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滥做滥收，结果反给隆发等号占了上游。和草席齐销的还有绳席和辫席。辫席花样虽多，但制作技术单纯，一般按洋行指定的样本织制。绳席就不同了，原始的绳席只是纯白席，后来由日本传来印花技

术，如太平镇的超盛号是专门代客加工印花的，印花席销行日久，顾客有些厌腻，于是时花席起来迅速地代替了花席。名牌的穿鼻绳时花席是“新虎门牌”，这种席是“禁心网”即凹凸花。这种席的特色是花纹玲珑显露、色泽调和而雅致、而且绳地匀滑、配色晶洁。不论伦敦或利物浦，都争先订购，就是荷兰、希腊也极其畅销，这是太平镇建业厂的名牌产品。其后他添雇名匠，如梁九根、梁淦、叶尤、叶伦等，都是当时的绘染名手，于是相继推陈出新，演变改良，增加品种，像后来的“宝山牌”、“黄岐山牌”、“莲花山牌”、“摩登牌”、“新生牌”、“凤鸣牌”、“荷花牌”等名牌时花席，与“新虎门”一样绘炙人口，蜚声海外。这时候那些大红大绿、浓得不开交的印花席图案，已不合顾客口味。梁九根制图的特色是线条明朗、色泽朴素；而梁淦制图的特色是淡雅活泼。时花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选料问题。有一次，广州虎记厂，费了很大气力设计出一幅时花席新图型叫做“鱼出燕窝”，在图案上看来比建业所有名牌花款精美得多，但织成席后，却大有逊色，最大的毛病是选料不精，那些规格复杂的穿鼻席，织在席面上，露出一条粗一条细，很不协调的花纹，加上配绳草色淤暗，衬托起来很不相称。所以建业厂一般职工，对精选原料成为习惯，一遇不合规格的原料，很自然地剔出不用。建业的产品还有一个优点是“绝少发霉”（一般草织品在雨季中发霉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他各货畅销，产品贮存时间短暂，因此货到销场，色泽更比别家鲜亮。

草绳类的著名的商号是莞城厚福厂，他唯一的产品是

“飞马牌”手搓草绳，尤以幼（细）绳更著名（即1号和2号草绳）。它开设时间前后约二十多年，解放前它没有复业，但还有不少国外顾客指名要订购它的货品，厚福厂的手搓草绳，的确做到珠路匀滑、草色明亮和绳身的粗细符合标准，够干燥，保管严密，绝少翻潮。当时一般草绳老板只为盈利，欺骗顾客，如道滘建业厂老板为了偷工减料，限令工人织制元席时，只许疏，不许密。如流记厂把野生水草织成草辫冒充人工水草的草辫销出。1932年席老板叶始妹，把黄草绳掺进白草绳里，因为它掺量小，不为顾客发觉，最后香港礼和洋行查明是经纪商号谢发记经手，这次全部货款仅五百余元，辗转增高扣价，它终于被扣价1200元。干度不足，欺骗买方是很普遍的，如时香厂经营七十年的草绳业，从来不曾有过一包十足干燥的草绳，它的成产品只晒至97%干度，这样就不会变质，珠路比较饱满好看，但它每百斤加重二斤，洋行在验收时发觉每包超重二斤，觉得它诚实可靠，但过了三个月，水份蒸发后，只得99斤。

厚福厂的产品干度是足够的，这离不开它经营管理的努力，但手搓草绳的生产者，都是厂外的家庭妇女，既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也难于挑选熟手，各家产品，都是精粗混合，一般老板只挑出那些极其碍眼的，降价沽出，相差有限的总是混过去，如果认真地选成本就大了。厚福厂对精选的幅度并不比同业强，但它的质量却卓越优良，原来另有秘密。当厚福开设不久，望联乡有一家草绳店叫做荣兴昌，老板方启荣，和厚福的老板叶良交谊很深，荣兴昌生产的1号和2号手搓草绳是卖给香港恒祥盛的，当时望联乡还没有帆

船直往香港，而帆船的开出时间也无定期，一定要在东莞城贮存，候船转运，荣兴昌便托厚福转运。当荣兴昌的草绳搁存在厚福的时候，叶良便指使他的亲戚吴培，悄悄地进行偷换，把自己的中等货换了他的上等货，把自己的下等货替换他的中等货。这样足有四年之久，未给对方察觉，而厚福的声誉也就确立起来。后来方启荣渐起怀疑，设下暗记，才被揭发。

机制草绳最著名的厂号算是太平镇和盛厂。老板陈省三在未起家前是善于冒充名牌的，但曾经因冒牌吃了一点亏。自从投机暴发后，觉得冒牌很丢面子，也不是持久办法，决心奋起自立门户，除了现有的规格必须遵守外，还要使自己的产品格外精美，他在各项品种改良的尝试中，除了扭草外得不到成绩，后来他发觉大路草所制成的草绳光泽闪亮，假如拿出来和双造草的产品比较，的确判然不同。因为他的资本大，经营的范围广阔，选草没有困难，他便暗暗控制所有的大路草。他的成品色泽齐一，光彩焕发，便取名“飞机牌”，才进市场，便受顾客欢迎，国际声誉一天比一天巩固，在西德的汉堡尤为著名，价钱比别厂高出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间，是草绳史中的名牌货，与和盛的“老虎牌”扭草及日本草和东栈的“双鱼牌”、广利的“蝴蝶牌”齐名。

草席的带头人是陈平阶，他是莞城镇兆泰的老板，是全县产量最高的方席厂，在美洲很有名，他的产品特色是熏过硫磺，光泽明洁，而且经硫磺消毒后不易发霉变质，他对包装特别讲究，力求整齐美观，在外表上也比别人好看。

兆泰是方席行业的最著名的厂号。

三、历年产销数量及行销范围

东莞草织品可分为6类：（1）水草类（2）草绳类（3）草辫类（4）绳席类（5）辫席类（6）草席类。在类中再分为项，每项中分为许多细目。细目部分，这里从略。

（1）水草类。将农民上市的水草经过加工复制，成为各项规格，计分为：日本草、扭草、直庄草三项。（甲）日本草，原是直庄草的一种，但加工程序比较复杂细致，而且数量大，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品种，年销量25,000担至34,000担。1906年的年销量32,000担，主要的销场是日本，抗战后直到现在销路还没有恢复。（乙）扭草，年销量约12,000担至26,000担，1906年的销量达25,000担，1933年因橡胶滞销，影响销量暴降，是年出口约12,000担。主要销场是新加坡、马尼刺、暹罗及南洋一带；也有经日本商人转销我国烟台、大连、龙口、牛庄等地。（丙）直庄草，年销量约16,000担至22,000担，1906年销售量18,000担，主要销场是香港，由香港草商加工后混充各种草类出口。1910年至1913年各类水草的出口，据日本人的统计总销量达70,000担。（见支那物产综览）。

（2）草绳类，只分为手搓草绳，和机制草绳两项，用途相同，制法差异。过去的销售量很难查考，根据1911年至1913年香港的天英号和恒祥号，日本草绳椅桌共1,100张，每张用绳7斤，日需手搓草绳7,700

斤，加上直接出口草绳，估计年销量约32,000担至35,000担，1920年至1930年因军事影响劳动力缺乏，降至21,000担至18,000担之间。1930年以后机制草绳的质量提高，产品符合标准规格，渐渐代替手搓草绳，产量次第增加，草绳机的设置越来越多，据调查1937年全县草绳机达1,500部，平均年产量每部14斤（2A绳）计算，其中开动约70%，再扣除淡季停工，年产量达31,000担，其中直接出口的约26,000担。1946年至1948年，因西德经济还没有恢复，国内生产障碍重重，平均年产17,000担，其中直接出口约6,500担。主要销场是德国汉堡，及英国伦敦、利物浦，其余欧洲、美洲、澳洲都有销场。

（3）草辫类，主要的品种分为三级辫和七级辫。三级辫是四方席和辫元席的原料，绝少外销。七级辫的年销量也有限，一般年销量200担至400担，主要销场是荷兰等国，美洲也有销场。

（4）绳席类 可分为蛋元席和环边席（扭草绳席包括在内）两项。蛋元席原本是广州的产品，1927至1930年逐年增加，年销量平均22,000包，1933年传入道厝，渐渐代替广州，到1939年销量达17,000包，1948年因英国加紧控制进口外汇，下降为9,000包，1949年至1952年平均年销达23,000包，主要销场是利物浦、伦敦、荷兰、雪梨、墨尔本等地。环边席（包括扭草绳席、时花席）年销量约7,000包至11,000包，1935至1937年为最高峰，年销量

平均达12,000包,1946年至1948年生产不振,平均年销6,000包,主要销场是英国、澳洲、荷兰等国,美洲也有销场。

(5) 辫席类,分为辫元席和四方席两项,辫元席是解放后的新品种,现在还是在试销阶段,尚待发展。四方席是1946年开始试销,发展迅速,但因劳动力缺乏,供不应求,1947年后销场更进一步扩大。1947年至1949年平均的年销量达5,000包左右。主要销场是美国、英国,其次是荷兰、丹麦及西欧各国。

(6) 草席类、分为地席和床席两项,床席又分为白床席和色床席两种,以色床席的产量为主,小部分销流于本省各地及广西的梧州等处,而外销数量则占95%以上,主要销场是印度、暹罗、(泰国)印尼及南洋等地,年产量60,000至180,000包,占席类中的重要地位。地席类分为杂花、时花、白密珠、大时花、密码时花、什花长机、假全色、印花多种。主要销场是英、美、荷、法、澳洲,及阿拉伯等地。1910年至1914年销售总量平均每年约180,000包,欧战后1919年生产虽已恢复,这时候草田已改种其他作物,水草的供应不足,短期内恢复不来,这时全县的织席机虽然共有3,000部,但有1,000部完全停歇,1,000部半停歇,实在开动的只有1,000部,是年的草席类的产量约90,000包,到了1920年才增至130,000包,1921年以后因地方扰乱又下降为110,000包,1926年至1930年更下降为100,000包,1932年至1935年再下降为6